

戴荣里

体弱了,一感冒就涕泗横流。师弟新疆饭店请客,贪杯误事,当晚身体就闹别扭。第二天一早,头脑昏沉,弥漫中怪梦连连。学生魏薇母女从贵州来,强挪身体迎接,返家时四体乏力。怕与高血压有关。余患病,很少吃药,有医生说这样可以增强免疫力。

本来应该很惬意的周末,度过了一个难受的礼拜六。

周日在家读书,胞妹来电话叙及其厂遭盗窃事,心情更加不爽。言语中训斥胞妹几句,过后又觉得过分,一本原计划读完的书只好丢在一旁。生活由芜杂的事情构成,人处在病与不病之间的感觉最难过。中午时分,好友李君喊我赴宴。至和顺小镇,几杯普洱下肚,方感通体舒泰。李君劝我少酌,恭敬不如从命,二三杯美酒品过,涕泪竟然止住。喝酒治感冒的理论暂时有了注脚。人长了年岁,免疫力开始下降,本喜欢在家吃饭,粥好菜香,无奈朋友同学频繁相邀,总是磨不开面子,虽无利益瓜葛,却有身体担忧。心善有时是身体的杀手。平日子里不累时很少午休,这场酒回来,虽觉身体有些转好,终也有些疲乏,头一沾床,就呼呼大睡了。

醒来但觉精神大好,两碗粥一喝,人顿觉有了气力,突然有了散步的冲动。穿上丝绸短裤,有些黄世仁的感觉;扯上红色体恤,提醒我也曾青春过。沿着上班走过的路,先向西走,抵达公园,再一路向北,不觉黄昏就近了。

今年和往年不同,一走路就爱出汗,有说好的,也有说虚的劝多休息。平时早晨上班路上,要通过微信给原生态文学院的同学们上一个小时课,坐上地铁,才觉有些困乏。靠打开一本书驱赶疲劳;我的好多书就是在地铁上读完的。有人见我发朋友圈,不是山水,就是美女,以为我是浪荡公子,细心的读者会根据时间猜测判断,大多是在一早一晚上下班路上拍摄的;面对文字和图片,仁智各见,你不能堵住别人的嘴,把一个人说到最坏,也就是那个人好的开始,所以我不介意别人的尖嘴。

人是易受环境影响的动物。到了公园,似乎两条腿就会使劲迈开。周围都是运动的人,不运动你就是落后分子。沿着公园行走,看散步的胖子、瘦子,男人、女人,丑的、俊的,高的、矮的,老人、小孩,各有其趣。和早晨散步者斗志昂扬的气氛不同,晚上的公园多了一些生活的情调。跳舞的人婀娜多姿,甩鞭的人似也有一点柔情。这边是情语切切的恋人,那边是父女相逗的亲情。北京这几天雨多凉快,公园里的草散发出清香,和春天不同,这时的草香得有些过于浓郁,好像一进入草场就难以脱身出来的似的。与人竞赛的芦苇越长越高,探身到路中央来了,它们的齐整让人惊讶。自然的事物,因为是自然的规整,自然给你自然的享受。我在那些芦苇前留影,手轻触一朵花或一根草,做亲昵状,伊说我做作,其实我是自然亲切的。

走到稻田深处,我凝望这片城市中的稻田。有一年深秋,我报名参加公园里的稻子收割,感受的不是农民的辛苦,倒是收割的欣喜。这些稻子在公园里与周围的绿色融为一体。等到金黄呈现,才能现出与众不同。一年四季常见的两个大鸟巢,此刻掩映在茂密的树叶里,黄昏把树叶掩埋,路灯下的荷塘此刻也倦懒起来。我对伊说,有人善嚼荷花茶,到黄昏时分,将茶叶放入荷花中,晚上,荷花团拢了花瓣,第二天花瓣打开时,那茶则会透着荷花的芬芳。伊很惊奇,凑近了看那荷花,原来竟真是开了又团上的。那些荷花们如劳顿一天的人们,渐渐地睡去了,亭亭玉立的荷花杆立着,衬着或舒或卷的荷叶,有贴着水面的荷叶,铺成绿绸,旁边涤荡着水草,我在靠近荷花的石头上,嗅闻荷花的香味,满池子的香气不同于早晨怒放时节,就如清茶之于普洱,已是两种味道了。伊耐不住在荷塘边的时光,大约是不耐了岸边柳树上的蝉鸣。伊说:蝉鸣是求偶的信号吧?我戏言,那蝉的荷尔蒙含量也够大的。没有蝉鸣的夏天似乎不叫夏天,犹如沙漠,我指着两棵挺拔葱郁的塔松对伊说,倘若这两棵树在沙漠上,就会给人无限的希望和向往。它们在城市里就平淡多了,一如蝉鸣,倘若在沙漠里听到,好比听到大雁的叫声。

走着走着,脖子甩开了,腿也打开了。不知不觉汗水溢满了全身,感觉整个黄昏也被汗漫一般。回家时,身体大好,急忙拉杂写下这些琐碎的文字,算是这个夏天的一个细节吧。



## 初秋感怀

汪发楷

湛蓝尽染苍穹深,  
洁白畅游天幕清。  
高风疾吻万树舞,  
微露细吻百草芬。  
落黄款款点秋装,  
飞雨依依熏夏烟。  
长留一叶知冷暖,  
总舒双臂拥初心。

董改正

去北京参加书展,再去拜访前辈和老同学,忙忙碌碌地再次与北大失之交臂。细想来,还在一个“怯”字,若是下定了决心,总是可以挤出时间的。就像一个神交已久心心相印的红颜,真的要见,需要很大的勇气。

第一次知道北大,是我上小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,村里一个清华学子在石桥上等他的北大女友。我们一帮小孩子你推我搡,等待看热闹。那个女孩子终于坐着一蹦三尺高的三轮车来了。她扎一条马尾辫,面目清秀,一口编贝小齿,自信俊朗,穿的校服上印着八个字“天之骄子,国之栋梁”,立刻把我们镇住了,更何况他们竟然用英语交谈。从此那八个字印在我的脑海里,沉甸甸的。

我上初中了,知道了关于北大更多的信息:那里风景优美,人文荟萃,那里有湖光塔影,有蔡元

培胡适,有鲁迅钱穆辜鸿铭;那里有高大的银杏树,在秋风里染一身金黄,那里有未名湖。想象在轻盈的雾霭晨岚里,带一本书走过小桥。想象白发的先生,憧憬漂亮的女生,那张扬的青春,该是怎样的一个跋扈飞扬。北大,它成了我读书的终极梦想。

未进北大,心里早已自许。不知天高地厚地臧否历史人物,谈论时政得失,不屑与“乡愿”交谈,所交皆是“狂狷”,常常的议论风生令师长担忧。这样的“愤少”,自然不把数理化学放在眼里,罗家伦、朱自清都是数学0分进的北大,钱钟书数学15分,吴晗数学0分进的清华,结果可想而知,从“愤少”到“愤青”,我的数理化只能堪堪及格。那年高考,我没能考中大学,更遑论北大。

我龟缩在一个专科学校里,品味理想幻灭的滋味,品味年少轻狂的苦果。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,我向来鄙夷庸常,却发现自己其实庸常。当别人都在努力时,我却在好高骛远地关注人性、生死、历史等等

之类的大词,却没有新的阐发,只是为了青春彰显自我的方式罢了。君子不器,我学的恰恰是电器专业。我的人文北大,离我已经越来越远。

不得不承认,我只是个庸常的人。我的堂弟与我遭遇相同,他放弃了工作,重新参加高考,三年后,他考取了安徽大学。毕业那年,他读了研究生,然后考取了公务员,终于现世安稳。我没有重起炉灶的勇气,我参加工作,结婚生子,下岗,再就业,闲暇读书写作,无非豆腐干大的文字,并无大的建树。北大梦,已经淡出我的梦境。只是在每年的六月高考季里,会被这些热词碰触,心尖停了蜻蜓一般颤动。

2008年年末,我滞留北京。我穿着雨靴,踩在深雪里,一路打听,终于到了北大门外。寒假的北大,没有几个人。高大的石狮子落满了雪,两个保安,隔着车道说着话,一个穿棉袄戴帽子的老大爷,推着自行车过了大门,跨步上车,骑着走了。我径自向大门走去,保安没有拦我。我心里说:我来

了北大!只走几步,我就折回了。我欺骗过了保安,却欺骗不了自己的心。我成了王徽之,却因迈出这几步,风雅全无。

后来多次经过北大,也只是遥遥望。年过四十,上有老下有少,我的梦想很简单,让他们幸福,搁浅自己。我自认为已经低到尘埃里,却并不被许多人接受,很多人笑着对我说:你是文化人,你清高,我们哪敢高攀?原来,这么多年的北大梦,一直拯救着我,虽然我卑微,为讨生活在世俗奔走,却终于没有泯灭思想火花,没有被世俗彻底的同化。我骄傲,虽然我只是怀着北大梦的非北大。

又是一年青春梦想张扬或失落的季节。现实往往残酷,而梦想是飞离俗世的翅膀,即使是贴着地面飞翔,怀揣永远不妥协于生存现状的倔强,便也有遇着风力一冲飞天的可能。很多时候,不是梦想拒绝了我们,而是我们放弃了它。梦想是引擎,我的北大梦,在精神的高度,提着我,拉着我,不被泥泞污秽了心灵。

# 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

孙婉

看着田地里高高的玉米秆,还有背着书包边走边嬉闹的孩子们,我知道又到了收获的季节,也是开学的季节。和以往一样,我提早到校开始备课和迎接新生。作为一名乡村学校教师,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工作生活。

这是一个快乐无悔的选择。大学时同学们常常聊起理想,那时候大家对未来满怀憧憬,充满信心却又有些忐忑。我的理想更明确一些,受到当了一辈子教师的外公影响,我从小对教师职业充满向往。高考后我如愿被师范学院录取,四年大学转眼就结束,就业选择却一度成了问题。和很多同龄人的父母一样,父母希望我进个机关事业单位,他们觉得当老师起早贪黑太辛苦,但我还是按计划做好了教师岗位的考试准备。

顺利通过笔试、面试和体检等环节,我终于幸运地成为一名教师,内心的喜悦也溢于言表,父母也为我能够如愿以偿感到高兴。但当听到我考的是特岗教师,要分到农村的学校任教,父母脸上瞬间没了笑容,他们担心我从小生活在城里,难以适应偏远农村的生活环境。但我想那么多人都可以

适应,我也同样可以做到,何况田园风光是那么美好。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期待,几经辗转,我来到了现在所在的学校,这是整个县域最偏远的乡镇。

学校的偏僻艰苦还是超出了意料。记得曾有同学老家就在这里,小假期她常常独守宿舍,最初同学都很不解,后来才知道她回家路途太远,如今公路已经进乡入村,但路上还是要花不少时间,好在沿途风景不错。然而,等到学校报到时,我的心情一下子失落很多。以前只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景象出现在眼前,楼道里没有水管设施,用水还要自己从一楼提,厕所离宿舍很远,晚上甚至不敢出去,宿舍里还有小动物走动,虫子鸣叫和蚊子叮咬让我一宿难眠,于是灾害灵成了生活必需品。

最初的几天我倍感沮丧,也纠结过是否离开,但当我看到其他年长些的老师习以为常,看到带着稚气又淘气顽皮的孩子,我还是决心既来之则安之,鼓励自己一定得坚持下去。在校长和同事们的帮助下,我终于在煎熬低落中缓过神来,学会了如何与学生相处,老师们和学生们的质朴热情,让一个无处安放的心灵得到了温暖。

我曾以为老师美丽又神气,可以“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”,当长大后真的走上讲台,才知道那美丽

与神气原来真不容易,我带着一个年级的数学,还带着一个班的班主任,有时还要教教学生音乐,甚至还曾教过语文。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时,我比学生还紧张,差距让我知道,教学并不只是字正腔圆,授业还要讲究门道。很多孩子父母外出打工或者无力辅导功课,他们眼中的学校更像个托管照料中心,于是,我就几乎成了部分孩子的家长,既要关心他们课余时间,又要惦记他们吃穿冷暖,不时还要与他们的父母交流沟通。

这是份平凡的工作,也是在播种希望,很多孩子都背负着父母家庭的期望,乡村条件比不上城市,但同样充满五彩的梦想。看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乡村,甚至进入大学和城市,自己也有种梦想成真的幸福,这大概就是初心吧。

特岗服务期早已结束,我仍然留在这里教书,在当地和学校的关心下,我也从初来时的一间小屋搬到了一室一厅的宿舍,网络则帮我打通了与世界的山水阻隔。

新学期伊始,又有新的老师加入这支队伍。我想,在课余时间,我们可以一起尽情呼吸乡间的新鲜空气,还可以看一茬茬的孩子们追逐嬉戏。就像陶行知先生说的那样: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。



明白自己是谁,适合做什么,目前该干什么,比盲目去努力更重要。

赵春青画

# 老北京的豆汁儿

韩磊

寄寓京华十多年了,居然喜欢上了老北京人爱喝的豆汁儿。前不久,从外地出差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,拖着拉杆箱出地铁站将近小区大门时,忽然看到马路对面冒出来一家豆汁店,唤作“老磁器口豆汁店”。不由地叫出了声来:“好啊,家门口有了豆汁店啦!”然后匆匆进店要了两碗,夹一筷子咸菜丝放进豆汁儿碗里,不等搅拌均匀,就地趁热呼噜喝了下去,喝得大汗淋漓,仿佛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,浑身舒坦,路途的鞍马劳顿一扫而光。

豆汁儿是北京特产,天南海北跑了多年,没在别的地方见到过。其出身低微,是绿豆做粉丝,粉皮的下脚料发酵而成的。价钱也贱,刚喝的两碗才3块钱。但熬豆汁儿是功夫,非行家不可。据说要顺着某一个方向熬边搅,火候适当,这样熬出来的豆汁儿才好,不稀不稠。而且熬制过程中不能添水,否则出锅的豆汁儿就懈了。据说豆汁儿有清热、祛暑、健脾、开胃的功效,虽然看起来色相欠佳,闻起来一股馊味,喝起来有些酸臭,但喝完后满口回甘,浑身舒服。京味作家邓友梅曾形容过:“就如同洋人吃臭奶酪,吃不惯者难以下咽,甚至作呕,吃上瘾的一天不吃就觉着欠点儿什么。”

我就属于邓友梅所说的后者。当年从河南到北

京谋生,第一次慕名去喝豆汁儿是在护国寺小吃店。当时要的是标配:豆汁+焦圈+咸菜丝。说实在话,焦圈不敢恭维,油炸的东西,凉巴巴,硬梆梆的,吃不惯,但豆汁特对我胃口,喝过几次之后,就割舍不掉了。此后十余年间,北京老城区大多数豆汁店我都光顾过,比如阜成门的华天小吃、天坛公园北门对面的磁器口豆汁店等。

几年前的一个秋日,我背着相机在北新桥一带拍胡同,在一条窄小的胡同里发现了一景:人们拿着大号的可乐瓶子,拎着不锈钢锅,端着盆,排着十几米的长龙,在一家豆制品作坊买豆汁儿。我大喜过望,一是发现了好镜头,劈哩叭啦一阵猛拍;二是发现了豆汁店,拍完这组镜头我也排在队尾,买了一大瓶豆汁儿带回家自个儿熬着喝。就这样,一来二去,北京豆汁儿哪家地道,哪家味正,也分得出一二来了。

可以说,像我这样的非北京土著能喝豆汁儿的绝对是少数,实际上许多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的人,也接受不了它的味。记得喜欢上喝豆汁儿之后,抱着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的想法,我很热心地请太太和儿子去喝,太太闻了闻说:“这什么东西啊,酸酸臭臭的,实在喝不了!”儿子则只喝了一口,就作呕反胃吐到了地上。最后,他们娘俩儿的两碗也都归我了。后来请老岳母去喝过,老人家尝了一口说:“勉强还能接受,可是也没觉得好喝。”老太太一定不喜欢,不是

忍心拂了我的一片好心。后来还带同学、朋友去喝过,没一个人能接受。

虽然豆汁店离自己家都挺远,可我还是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专门去喝,而且一次都是两碗。两碗豆汁儿,两个油饼,配小半碟咸菜丝,成了我人生的一大快事,甚至觉得比吃山珍海味还有乐趣。特别是夏天,来碗热豆汁儿,就一口气喝了六碗,还想要……红红的辣咸菜,喝得汗流浹背,浑身痛快通畅。

邓友梅在一篇文章里记述了一桩趣事。说的是《城南旧事》作者林海音1990年代从台北回到北京,被问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,她回答:“别的事没有,就想叫你们领我去喝碗豆汁儿。”文章写道,林海音吃其它小吃时挺谦逊,挺稳重,可豆汁儿一上来她老人家显出真性情来了,竟一口气喝了六碗,还想要……之后她说:“这才真算回到北京了!”

想想,我的最高纪录也只是三碗,距离当年七十多岁的林海音老太太还相去甚远……

杂 说



## 被我称为师傅的老师

欧 阳

教师节近了,很多人都在说教师的事儿,于是我想到了师傅。

所有教育过我的教师中有一人,也只有这么一位,我称其为师傅。以前当面不敢这么叫,怕联想到工人师傅,后来有了网络,云上碰面很自然地就师傅师傅的叫上了,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乐意。

师傅便是李德顺先生,现而今是大师级的人物。我作为劣等学生愣叫师傅本该是有些惶恐的,可扪心自问,倒真没有谦卑态度。梳理一下原因,应该是“师傅”的念头成型在先;在李老师大成之前,因为一些小事的感触,便使以师傅视之了。

李老师当班主任时主持过一次我们的班长选举,哥几个把这事儿当成了娱乐活动;谁票少下轮就投谁。结果三番五次都没有过半数的家伙,先生显然有些恼怒,脸色可见。意外是他并未高声斥责,反倒是平和严肃地说:尔等如此不负责任,以后能担当什么?!别的学生怎么想不知道,我因之确实羞愧了一下。当然,更重大的影响是班主任之“不怒”,为什么?这让我想了好几天。

作为辩证、历史唯物主义“原理”的老师,坦白说我不敢以德顺先生的学生自居,既然精神世界也是客观的物质运动,干嘛要分成二元的东西?这太乱,搞不清楚,故而只好闷心里擅自感悟微小事。

一次在海淀影剧院看电影,幽暗中俩逃课同学一边乐一边胡评电影,结果后面有个声音说影响其他观众。透着微光斜眼一看,居然是李德顺同志——电影快结束前赶紧溜号。

“他不会认出我们吧?”出来俩俩同声问。

后来我们担心的事根本没影儿,看来是虚惊。接着的寒假我和兆平没回去,为自在一些,哥俩亲自制备了电炉。也是巧了,陈先达教授的字很难辨认,李老师让我俩卷写一遍,这不算事儿,可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,老师必须上门询问进展,问题是他也不挑时间,一天饭口上把俩理锅造饭的伙计逮个正着。揣着复杂心情而面面相觑的我们未能荣获李老师的训斥。他先是探问抄字进度,语气温和,伙夫心情顿时良好很多。本以为学问不关心炉火事务,末了他还是道出了衷心劝诫:学校查出来事小,要是闹出烟火你们扛不起,让好好考虑云云。

他不轻不重的话很容易入耳,故好好考虑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后续方略,结论是那次看电影他一定知道逃课的我们。

后来写论文,我的胡思乱想是科技之于人的进化,和“原理”一点也不搭界,没想到辅导老师还是师傅。初稿后,他让我多读些书,维纳、贝尔之属外,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髦的“第三次浪潮”等信息类相关书籍。他显然低估了,那些书彼时皆已翻阅,它们所称不过是科技重塑、强化人的肢体功夫而已,而我在想别的事。又或者老师认为论文须有引文、注释,但他并未明说,应该是让我自己去体会、学成。

然而,我没办法找到可以引述的句字。一来是自己读书几乎从来不做笔记,二来是我瞎想的推测:大脑智慧质的跃升和人性(异化了的)解放,这些“自然进化”解决不了的问题,可能只有通过日后科技的发展来达成。这些东西当时好像没有大师认真论述过——现在的基因类学术估计还在某个疯子脑袋里未成理论体系。

总之是我自己说不清楚的事,并辩称没办法找到学术文字来论述。想来这话李老师很爱听,“你怎么信口就来啊?”他立马就把我顶到了墙上,老师说:就说你文内讲的性解放吧,你要说什么?人性的解放是有所指的,“性解放运动”所指是本能的性,也可以是人性解放的一个侧面,女性解放也是一种性解放,这样的论述少吗?你给出明确的定义了吗?……做学问,即便是猜想也是不能想当然的。

我无言以对。那么深的巷道对交论文而言是没时间去探究了,最后像特根斯坦那样呈上了一字没“引”的论文,不同在于,人家是聪明绝顶的大师,而我是自以为是的傻瓜。为了把自己从傻瓜队伍里摘出来,有好些年我总想起这档子事。

实际上我对师傅的学问不甚了解,他后来的《价值论》也没读过,他学问的大小我不敢太当事儿,但这些细碎的小事在我心刻下了痕迹,做人、做事,就像从前的师傅那样,真起到了塑型的作用。现在看,“师傅”的称谓,应该就是这些慢慢雕刻才留驻在我心里的吧。